

WIRE

国际特赦组织通讯 2014年 5/6月
第44卷 第3期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我们能够
停止
~~酷刑~~



INSIDE THIS WIRE



现在开始，由你而起，终结酷刑

国际特赦组织「停止酷刑」运动需要你站在施刑者和受刑者之间。**第 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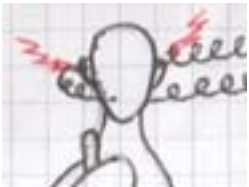
自 1961 起开始对抗酷刑

国际特赦组织对抗酷刑的历史长达 50 年，请与我们共同回顾这一路上的里程碑。**第 6 页**



挺身而出， 一起对抗刑求克劳蒂亚的人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谢蒂与酷刑幸存者克劳蒂亚·梅地那在墨西哥会面。**第 10 页**



痛苦的真相

阿里·阿拉斯根据在摩洛哥监狱的亲身经历，画出他自称遭受酷刑的情形。他仍被监禁在狱中，但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一定能改变现状。**第 12 页**



被夺走的未来

摩西斯·阿卡图巴撑过了酷刑，但他能逃过死刑吗？来看看你能怎么帮助他。**第 14 页**



人权医师

菲律宾的奥劳拉·帕容医师在监狱牢房中展开对酷刑的长期抗战，她在**第 16 页**告诉我们这么做的理由。



令人难忘的夏令营

行动者告诉我们，国际特赦组织「欧洲 S.O.S.」年度夏令营让他们的生命从此改变。**第 19 页**



众人发声促成改变

阿茹娜·乌佩瑞蒂医师和莎米达·普拉丹已为尼泊尔妇女权利奋斗数十年，透过国际特赦组织的帮助，她们离目标又更近了一步。**第 22 页**

其它内容

班克斯为俄国 #WithSyria (与叙利亚同在) 晚会重新创作了代表作《女孩与红气球》(**第 2 页**)；声援被监禁的埃及记者(**火线传真·第 3 页**)；乌兹别克农民上街示威抗议，换来 18 年徒刑(**第 11 页**)；「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运动正式启动(**第 24 页**)。

取得WIRE

線上閱讀或下載：
livewire.amnesty.org

訂閱方式 (一年六期)

* 國際版
Email: wire.subscribe@amnesty.org
Tel: +44 20 7413 5814/5507
35英鎊/54美元/41歐元

* 國際中文版
Email: info@amnesty.tw
Tel: +886 (0) 2 2709 4162
每本新台幣250元/港幣75元
訂閱一年份 (一年六期含郵資)：
新台幣1,600元 / 港幣700元

國際特赦組織出版部
2014年初版
www.amnesty.org
© Amnesty International Ltd
Index: NWS 21/001/2014

印刷: 依您印數位創意印刷有限公司
本刊採用再生紙及環保油墨

版權所有，除非出版者事先同意，請勿加以翻印、儲存於任何檢索系統、或以任何電子、機械、影印、錄影等方式流傳內容。

發行人: 謝若蘭
發行所: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地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5巷14號3樓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019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Jiri Pasz

柬埔寨金边 S-21 监狱墙上的涂鸦，这里曾是一所高中，1975-1979 年间红高棉 (Khmer Rouge) 政权改为监狱和酷刑场所，现在是「吐斯廉屠杀纪念馆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用来纪念众多在此受难的人们。

www.amnesty.org/join

编辑手记：想象一个没有酷刑的世界

我们对没有酷刑的世界拥有清晰的愿景，国际特赦组织已为停止酷刑运动奋斗超过半世纪，我们不会放弃，原因很简单：酷刑是野蛮、不人道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该被正当化。

如同第 6-9 页的大事纪所示，我们数十年来的努力不懈已经获得丰硕的成就，包括让联合国通过禁止酷刑公约。

然而，世界各地仍有像你我一样正在遭受酷刑的人，你将在本期 WIRE 读到其中 5 人的故事：艾芙烈达、阿里、克劳蒂亚、狄洛蓉和摩西斯 (第 10-17 页)。

支持国际特赦组织「停止酷刑」运动，你将加入全球数百万人的行列推广这个运动，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在施刑者和受刑者之间筑起一道安全屏障，并向所有当权者发出一个简单明确的讯息：停止酷刑！

请加入我们，一同向前迈进，我们有权利活在一个没有酷刑的世界。

阅读 WIRE 在线版和 LIVEWIRE 部落格：www.livewire.amnesty.org ·
在推特上追踪我们：[@AmnestyOnline](https://twitter.com/AmnestyOnline)



保護南非的嬰兒與母親

得奖摄影师安娜列特·史汀坎普 (Annalet Steenkamp) 于 2014 年 1 月在夸祖鲁－纳塔尔 (KwaZulu-Natal) 拍摄国际特赦组织访问冉妮莉·恩都佛 (Zanele Ndlovu)。两星期前，怀孕的冉妮莉阵痛了 6 小时才等到救护车，分娩前 5 分钟才抵达医院。

我们拍摄的最新短片《断裂生命线 (A Broken Lifeline)》将告诉你，交通费用、破烂公路和救护车短缺如何让南非偏远地区的孕妇和新生的健康备受威胁，透过「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运动，我们将推动当局为她们提供更容易取得的健康服务。这部影片及相关调查报告将于今年 8 月发表，敬请关注。

观赏《断裂生命线》片段：
<http://bit.ly/LifelineSA>

感谢支持「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联署行动

这或许令人难以置信——全球共有 28 万人参与国际特赦组织「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运动，呼吁各国政府保护年轻人的性与生殖权利。今年 4 月，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

谢蒂 (Salil Shetty) 在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于纽约集会前夕，将这份联署书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这次会议的决定将对未来各方面的政策造成根本影响，从年轻人得到性教育的权利，到女性为自己身体做决定的权利皆涵盖在内。

关于「我的身体·我的权利」的最新消息，请见第 22-25 页。

10 大令人难忘的死刑电影

今年 3 月发表《全球死刑报告》的同时，我们邀请网友票选 10 大死刑电影。网友反应非常热烈，票选结果如下：

1. 《绿色奇迹》(The Green Mile, 1999)
2. 《越过死亡线》(Dead Man Walking, 1995)
3. 《铁案疑云》(The Life of David Gale, 2003)
4. 《光荣之路》(Paths of Glory, 1957)
5. 《索拉亚殉难》(The Stoning of Soraya M., 2008)
6. 《黄牛惨案》(The Ox-Bow Incident, 1943)
7. 《枉死青春》(Let Him Have It, 1991)
8. 《10 诫之 5：关于谋杀的短片》(The Decalogue V, 1988)
9. 《拥抱艳阳天》(Monster's Ball, 2001)
10. 《最后的绞刑师》(Pierrepont: The Last Hangman, 2005)

www.amnesty.org/death-penalty

「好像挖到金矿！」

你是否很希望复杂的人权议题能简化为一本好读好用的参考指南？今年 4 月由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的《公平审判手册 (Fair Trial Manual)》做到了！



一名小女孩在俄国莫斯科的 #WithSyria (与叙利亚同在) 晚上，放出一个心形气球，摄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全球 40 多国共数万人，包括许多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者，聚在一起纪念叙利亚危机 3 周年。涂鸦艺术家班克斯 (Banksy) 为这次活动重新创作了他 2004 年的经典作品《女孩与红气球》(下图)，115 个人道和人权团体参加活动，透过烛光和红气球表达支持和愿望，一同诉求将援助送达叙利亚所有需要的人们手中。国际特赦组织在今年 4 月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递交全球超过 14 万人的联署书，要求立即终止叙利亚平民所受的苦难。

文字的力量

《让人哭泣的诗 (Poems that Make Men Cry) 》是西蒙与舒斯特 (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和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最近共同出版的诗集，这本诗集让人看见文字和言论自由的力量，100 位名人，包括约翰·勒卡雷 (John le Carré)、萨尔曼·鲁西迪 (Salman Rushdie)、尼克·凯夫 (Nick Cave) 和史蒂芬·佛莱 (Stephen Fry)，分别用一首让他们感动流泪的诗，分享自身心灵深处的洞见。他们对这些诗作的描述和个人连结，和诗作本身同样强而有力，充满能量。

<http://bit.ly/PoemsMenCry>

况愈来愈严重。

自 2013 年 6 月新政府上台至今，已有至少 8 名记者遇害，其中 5 名在今年丧生，凶手包括政府情报人员、政党成员，以及像塔利班那样的武装团体。巴基斯坦当局只有在舆论关注记者遭受威胁时，才会装模作样地提供保护。

从 2002 年阿哈穆德·欧马·西德·谢克 (Ahmed Omar Saeed Sheikh) 因杀害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伯尔 (Daniel Pearl) 被定罪以来，只有少数几人因攻击记者被起诉。

加入联署，要求停止攻击记者：

<http://bit.ly/journ0>

www.amnesty.org/pakistan

巴基斯坦记者频遭攻击

我们在 5 月 3 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发布研究报告，揭露新闻记者在巴基斯坦各地遭到骚扰、绑架和杀害的情

火线传真

新闻无罪



康纳·佛琼 (Conor Fortune)，国际特赦组织新闻撰稿人

在一个晴朗的冬天早晨，我站在伦敦办公室的顶楼上，嘴巴被胶带封住，一架摄影机正对着我的脸，身旁 10 几位国际特赦组织新闻部同事，也陷入和我同样的窘境。

但幸运的是，我们并不是被绑匪抓来拍摄「我还活着」的证明，以便要求赎金的人质，我们在那里是因为，同为记者和媒体工作者，

我们有责任站出来抗议同业为了工作而失去自由。

事实上支持者为数众多，今年 2 月，世界各地 30 多个城市共有数万人参加半岛电视台 (Al Jazeera) 发起的 #FreeAJstaff 全球行动日，该电视台的 3 名员工自 2013 年 12 月起遭埃及政府监禁至今。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纪录显示，记者遭到威胁、身体攻击，以及因「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已成为全球趋势。

无国界记者组织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世界新闻自由指标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年度报告发现，武装冲突和各国政府对国安措施及监听手段的滥用，已造成全球新闻自由明显恶化。

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的《记者遭受攻击 (Attacks on the Press)》年度报告则指出，2013 年期间，全球共有 211 名记者遭到监禁，99 人因为新闻工作而被杀害身亡。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近期的纪录，许多国家的记者皆遭遇威胁，包括亚塞拜然、赖比瑞亚、墨西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叙利亚。

今年 5 月，在我们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时候，上述事实更加发人深省。

那天在顶楼上，我们希望向记者和他们的工作表达支持和敬意。新闻无罪，报导新闻并非恐怖份子的行为，且负责的新闻是保障自由的重要基础。

当记者遭受威胁、逮捕、攻击或被迫噤声，真相也将销声匿迹。因此，捍卫真相取决于我们手中，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你可以在推特上追踪康纳：@writesrights 以及康纳的同事们：@amnestypress

来函

我们永远期待你的回馈和建议！thewire@amnesty.org



我们可以 停止酷刑

你被吊在天花板下长达好几个小时，全身肌肉抽搐，电击棒在你身上游走，你被灌水灌到几乎窒息、被性侵、模拟处决，这一切都为了使你崩溃、逼你认罪，让你在自白书上签字，或供出重要情报。全世界没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自己被世人遗忘，无依无靠。

全世界都在用酷刑对付人民，就像对付你一样。

我们目睹使用酷刑的国家不断增加，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2011 年有 101 个国家使用酷刑，来年更增加到 112 国。

30 年前，国际特赦组织发起全球禁止酷刑的运动，时至今日，几乎每个国家都已立法禁止酷刑。

然而，只要瞄一眼新闻就知道，单靠立法是不够的。就在今年稍早，菲律宾警察成为新闻焦点，因为他们使用一种「酷刑转盘 (wheel of torture)」游戏，来决定如何对拘留者施刑。

酷刑方兴未艾，原因是各国政府和法律虽然承诺要停止酷刑，却没有采取实际的步骤，正因如此，我们决定发起新的倡议运动。

这一次，我们将在酷刑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筑起一座强大的堡垒，怎样才能做到呢？我们会不断坚持下去——坚持要有律师陪同侦讯、医师可随时诊察囚犯、酷刑取得的自白不能是呈堂证供、囚犯可以会见亲属，并且坚持将所有涉及施刑之人移送

法办。

既然体制已无法保护人民，我们将深入体制内部运作，正如本期 WIRE 相关报导所示，某些实际可行的步骤将能改变现状。

未来两年，我们将采取行动在各地建立保护人权的机制，例如在酷刑极为普遍并且沦为警察局例行手段的菲律宾和墨西哥，在法院经常靠酷刑逼供的摩洛哥西撒哈拉和乌兹别克，以及在被拘押者常遭殴打、假处决等虐待的奈及利亚，我们都会致力于建立保护机制。

这些行动无法光靠我们达成，我们需要你的参与，需要你挺身而出，站在刑求者和被刑求者之间。请采取行动，声援艾芙烈达、阿里、克劳蒂亚、狄洛蓉和摩西斯，详见本期第 10-17 页以了解他们的遭遇并声援他们。

我们询问全球各地行动者，为何希望停止酷刑：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很难形容 2003 年我在安哥拉警察局隔壁工作时的感受，我们隔着墙壁都还听得到人们遭受酷刑的惨叫，大声哀求警察住手。当时我感到无能为力，但现在我知道，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我们可以改变现状。」

Katharine Derderian，比利时 / 布鲁塞尔

© Af Rodrigues



「我曾听过一名酷刑幸存者说，『第一次被打耳光时，我花了一辈子才建立起对人性的信心完全破灭。』你不能靠着拆毁社会的梁柱来保护社会。」

Mauricio Santoro，巴西 / 里约热内卢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因为没带身分证，所以我在回家途中被警察逮捕，在牢房里，警察强迫我让一名未成年囚犯检查我的肛门，造成我巨大的心理创伤。现在，只要一想到肯亚的儿童将来可能对别人施加酷刑，我就无法心安，因此除非我们能停止酷刑，不然我绝对不会停止抗争。」

Charles Baraza Nyukuri，肯亚 / 奈洛比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之一，就是普遍的酷刑造成许多冤案，如果我们想要停止冤冤相报，建立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社会，就必须团结起来、停止酷刑。」

Lkhagva-Ochir Dambasuren，蒙古 / 乌兰巴托

© Amnesty International



「酷刑是这个社会最可耻的问题，身受酷刑之苦的人，他们的亲友也会连带受到创伤。身体的伤痕看得见，心理的伤痕却是无形的，没有一个幸存者能忘记这种痛苦的经验，无论怎么努力也忘不掉。因此我参与停止酷刑运动，希望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Gony Droni，以色列 / 特拉维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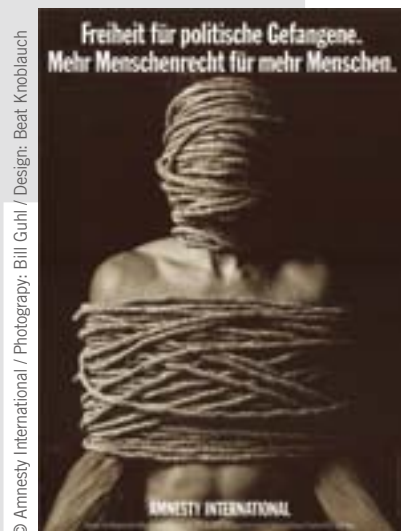
现在开始
由你而起
终结酷刑



了解停止酷刑运动详情：www.amnesty.org/stoptorture
追踪推特：@AmnestyOnline，并使用 #StopTorture

自 1961 开始 对抗 酷刑

我们首度发起倡议运动，希望「让酷刑和奴隶制度同样受人唾弃」。



▲ 国际特赦组织瑞士分会的海报：「释放政治犯，让更多人享有更多人权。」

「如果全世界对如此无耻至极的行为麻木不仁，那么最后一丝希望的光芒也将彻底熄灭。」

精神分析大师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在国际特赦组织世界反酷刑大会上发言。



▲ 1975 年 10 月在奥斯陆，挪威行动者手举布条：「酷刑正在 66 个国家中发生」。



▲ 荷兰漫画：各国独裁者联合站台抗议 1977 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国际特赦组织，获奖理由包括我们在推行的反酷刑运动。

1967

国际特赦组织在这一年开始救援政治犯，我们很快发现，世界各国政府经常对人们施加酷刑。

1968

「我们每天都收到世界各地人们遭受酷刑的报告。」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马丁·恩诺斯（Martin Ennals），1968-1980 年

我们揭发希腊军事政变后普遍实施酷刑的情况，如希腊特地在雅典设立侦讯总部，号称要「让所有希腊人不寒而栗」。

1972

我们将这一年定为「反酷刑年」，同年我们成立「紧急救援（Urgent Action）」网络，首位救援对象是路易兹·罗西（Luiz Rossi）教授，一名在狱中面临酷刑危险的巴西工会领袖。好几百名国际特赦组织行动者为他陈情，写信给巴西当局，终于让他在这一年成功获释。

我们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反酷刑大会」差点无法举办，原先提供会议场地的联合国世界教科文组织（UNESCO）认为，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违反了他们不得批评联合国会员国的规定，因此突然取消合作。我们马上找到另一个场地，共有来自 40 个国家 250 名代表与会，并从巴黎会场发送电报，将我们从 90 多国收集而来的反酷刑百万人联署书传送到联合国。

在国际压力下，联合国大会首度通过谴责酷刑的决议。



▲ 知名歌手琼·拜兹（Joan Baez）在反酷刑大会上发言。

1974

联合国于 12 月 9 日通过《反酷刑宣言》，这项重大决议为联合国制定具法律约束力的《反酷刑公约》迈出关键一步。

国际特赦组织创始成员海伦·班柏（Helen Bamber）协助成立「关怀酷刑受害者医疗基金会（Med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are of Victims of Torture）」，现已更名为「免于酷刑的自由（Freedom from Torture）」。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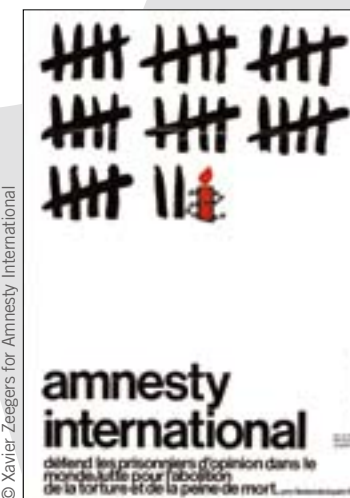
1976

我们发起倡议运动，阻止乌拉圭军政府刑求囚犯。



▲ 国际特赦组织墨西哥分会海报：「酷刑在乌拉圭」。

1977



▲ 国际特赦组织比利时分会的海报：「捍卫全球良心犯，为废除酷刑和死刑而奋斗。」

1983



▲ 图中的布条上写着：「他们在此刑求。」一群修女、神父和教友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波戈纽街 1470 号门前抗议酷刑，许多人作证表示在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的军政府执政时期（1973~1990），这栋建筑曾是秘密拘留中心，专供秘密警察对政治嫌疑人进行酷刑。

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得到 **20** 个国家批准后，于 **6 月 26 日** 正式生效，全世界朝向彻底废除酷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Design: Len Breen

1984

在国际特赦组织长期施压下，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反酷刑公约》，其中最受争议的两项议题是对酷刑加害者的普遍管辖权，以及如何有效落实公约。



© Amnesty International

▲「酷刑工具」：几内亚一名良心犯之子的创作，图中描绘许多人在桥下被绞死的景象。

1987

联合国宣布 6 月 26 日为「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
我们揭发全世界 100 家生产并销售酷刑工具的公司。



© Jean Gouders

◀ 该幅荷兰漫画描绘 1990 年代英国制造销往杜拜的酷刑工具。

1998

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做出重要判决先例，认定性侵亦为一种酷刑的方式。

在国际特赦组织提醒欧洲各国政府，有义务依据《反酷刑公约》拘押智利前总统皮诺契特之后，皮诺契特于英国伦敦遭到逮捕；尽管他因为体检的争议，已于 2000 年获释，但本案已朝国际正义迈出一大步。

1999

▲ 缅甸的行动者和酷刑幸存者在东京的缅甸大使馆门外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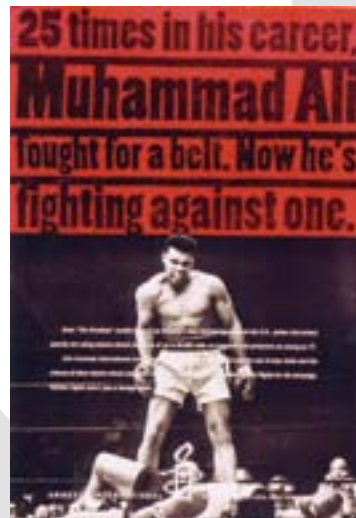


© Amnesty International/Kazutoshi Murata

2000

「这是装了遥控器的酷刑。」

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威廉·舒兹 (William Schulz)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海报：前重量级拳王阿里 (Muhammad Ali) 为反酷刑发声，推动禁止美国监狱使用「电击腰带 (stun belts)」的运动，这种腰带用遥控器控制，可对囚犯施以每 8 秒钟 5 万伏特的电击。

2002

联合国通过《反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针对拘留场所建立国内及国际综合检查机制。

我们开始对抗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中使用酷刑的问题，例如特别被用来作为酷刑方式之一的「坐水凳 (waterboarding)」。

© Amnesty International/Harrison Mitchell



▲ 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在英国首相东尼·布莱尔 (Tony Blair) 位于伦敦唐宁街的官邸前举行，抗议对恐怖主义嫌疑人施以酷刑。

2005

▲ 国际特赦组织丹麦分会行动者抗议「秘密引渡」恐怖主义嫌疑人的班机，此后 6 年，国际特赦组织陆续揭发欧洲数个国家协助美国中情局 (CIA) 秘密引渡和酷刑恐怖主义嫌疑人的行为。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6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表示，各国政府应预防并惩罚不由政府执行的酷刑，包括性侵、家庭暴力、切除阴蒂和人口贩运。

2008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永不向酷刑妥协，立刻关闭关达那摩」：行动者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旁示威。

2012

已有超过 150 国批准《反酷刑公约》，但酷刑仍然普遍存在于全球各地，正因如此，国际特赦组织决定立刻发动新一波「停止酷刑」运动。

「只要有人遭到酷刑，我们将伸出援手，共同追究酷刑加害者的罪责。」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谢蒂 (Salil Shetty)

现在开始
由你而起
终结酷刑



© Amnesty International

「我是来请你们帮忙的，」当我今年稍早在墨西哥见到克劳蒂亚·梅地那时，她说，「我要报案。」

克劳蒂亚的话深深触动了我，因为我知道她经历过什么。2012年8月7日凌晨3点钟，一批海军陆战队闯进她家，家中有她们夫妻俩和3个小孩。他们绑住她的双手、蒙住她的双眼，用卡车将她载到维拉克鲁斯市（Veracruz City）海军基地，指控她是某个暴力犯罪帮派的成员，但她断然否认。

之后克劳蒂亚告诉我们，刑求者不但电击她，还用塑料布将她裹起来再拳打脚踢，避免留下瘀痕。他们甚至性侵她，把她绑在椅子上，任她在炽热的午后烈日下曝晒。

隔天，克劳蒂亚被迫在她根本没看过内容的自白书上签字，她被当成危险的罪犯在媒体前亮相。但不到一个月，除了一项罪名，所有针对她的指控全被驳回，她也获准交保出狱。

有些墨西哥警察和军官认为，酷刑是调查犯罪的方法之一，他们用酷刑逼供，作为起诉人们的证

挺身而出 一起对抗 刑求克劳蒂亚的人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谢蒂（Salil Shetty）与墨西哥酷刑幸存者克劳蒂亚·梅地那（Claudia Medina）会面，过程发人深省。

据，再拿这些自白书证明墨西哥打击犯罪的丰功伟业。

克劳蒂亚设法向一名法官说明自己遭到酷刑，该法官下令调查，但负责调查的联邦检察署却置之不理，更糟的是，他们还阻挠克劳蒂亚接受由联合国支持的医学检验。若当时克劳蒂亚在表明遭到酷刑后能立即验伤，就能掌握更强有力的证据。

「我以前因为害怕，一直不敢说出来，但我不愿再逆来顺受了。」

事发后近两年，克劳蒂亚已厌倦处于等待的状态，「我以前因为害怕，一直不敢说出来，」她告诉我。「但我不愿再逆来顺受了。」她知道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受到和她一样的虐待，希望能阻止酷刑继续发生在其它人身上。

因此，克劳蒂亚决心公开说出她的遭遇，帮助国际特赦组织推动「停止酷刑」全球倡议运动。

我知道，起身对抗墨西哥军警势力有多么不容易，但我也知道，她并不孤单，因为我们有和她站在一起。

所以我回答她，是的，国际特赦组织及我们的300多万名支持者必定会帮助她及其它酷刑受害者

上图：2014年2月，萨里尔·谢蒂在墨西哥市与酷刑幸存者克劳蒂亚·梅地那会面。

者，这本来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我们将团结一致向各国政府施压，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不让酷刑再度发生。

见到克劳蒂亚使我获得无比的启发和希望，一名女性在遭受酷刑后仍能保有如此强烈的斗志、勇气和信念，让我的意志更加坚定。

这也让我深深相信，既然克劳蒂亚能够做到，我们一定也可以。

采取行动 >>>

你的信可以帮助克劳蒂亚：请要求墨西哥检察总长（Federal Attorney General）尽速对她遭受酷刑的案件进行彻底调查，公布调查结果，将应负责者移送法办，并要求他允许克劳蒂亚进行充分、公正，且符合联合国标准的医学检验。

信件开头请写「检察总长阁下（Dear Attorney General/Estimado Señor Procurador）」收件人请写：

Jesús Murillo Karam, Federal Attorney General/Procurador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Procuradu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Paseo de la reforma 211-213, Col. Cuauhtémoc, C.P. 06500, Mexico City, Mexico

Email: ofproc@pgr.gob.mx
Fax: +52 55 5346 0908 (请不断重拨，接通后用英文说「fax」)

返家之 漫漫长路

狄洛蓉·阿布都卡地洛瓦只是到市区广场参加一场示威抗议，却变成难民，并被判刑18年。以下是她的悲惨遭遇，而你可以帮助她。

狄洛蓉·阿布都卡地洛瓦（Dilorom Abdukadirova，上图）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妇女，住在乌兹别克东南部的安地藏市（Andizhan）。2005年5月13日前，她以务农为生，与家人一起种菜贩卖，并照顾4名儿子。

那天，狄洛蓉到市中心的巴布尔广场（Babur Square）抗议经济不景气，她听说总统会来，但却未出现。演讲者正在呼吁伸张正义和消除贫穷，突然之间，维安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数百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小孩。

狄洛蓉夹杂在惊恐的群众中，只能拔腿逃命，和其它大约500名示威者徒步走了25公里。在惊慌失措之下，她无意间跨过边界到达邻国吉尔吉斯。

她被吉尔吉斯转送到罗马尼亚的一处难民营，2006年澳洲政府认定她为难民，并赋予她永久居留权。

狄洛蓉非常渴望与家人团聚，急着想返回家乡。安地藏政府当局向她家人保证，狄洛蓉不需要担心害怕，于是她在2010年1月搭机抵达塔什干（Tashkent）机场，但却当场被警察带走，拘留审问了4天。



© Private

她和家人短暂相聚后，又被当局抓回去，接下来两星期都无法会见律师或家人。

2010年4月，狄洛蓉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意图颠覆宪政秩序」以及未经许可离开乌兹别克。

狄洛蓉的家人表示，她在法庭上看来非常憔悴，脸上还带着瘀青，他们认为她受到酷刑，而且被迫拿下头巾出庭。2012年她在塔什干女子监狱受到秘密审判后，又以「故意违反监狱规则」的罪名加刑8年。

我们认为狄洛蓉是一名良心犯，因为参加安地藏示威抗议而被判刑。

采取行动 >>>

你的信可以帮助狄洛蓉：请写信要求乌兹别克总统撤销所有对她的指控，立即无条件释放她，并对她声称遭受的酷刑迅速进行公正调查。

信件开头请写「总统阁下（Dear President）」，收件人请写：
President Islam Karimov, Rezidentsia prezidenta, ul. Uzbekistanskaia 43, Tashkent 700163, Uzbekistan



© Maxim Mammur (AFP) Getty Images

上图：2007年，一名警员在乌兹别克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竞选广告牌下巡逻，该总统已在任20多年。

乌兹别克：「系统化」的酷刑

1991年乌兹别克脱离苏联而独立，此后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连续赢得4届总统大选，该国无任何反对政党。

乌兹别克基本上不对外国媒体和人权组织开放，并严格控管国内媒体。对乌国3千万名人民来说，申请获准出国旅行十分困难，政治异议人士随时遭受严厉打压，贪污问题根深蒂固。

联合国曾表示乌兹别克的酷刑问题是「系统化」的，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持续收到的可靠消息指出，被拘押者遭受酷刑，方式包括把人们铐在暖气管或吊在天花板上殴打、使其窒息、针插手指甲或脚指甲、电击、性侵或对男人、女人施以性暴力。

我们新发起的倡议运动，就是要阻止乌兹别克人民继续遭受这样的酷刑或虐待。

痛苦的真相



这些涂鸦是阿里·阿拉斯 (Ali Aarrass) 的作品。上图是他和小女儿的合照，当时他们还过着快乐的日子。如今，阿里因恐怖主义的罪名被判刑 12 年，正在摩洛哥服刑。他否认一切指控，但因受不了酷刑而被迫认罪，他画的就是自己所遭受的各种酷刑。

阿里于 1962 年出生在摩洛哥北部的西班牙飞地美利亚 (Spanish enclave of Melilla)，15 岁移居比利时，拥有比利时和摩洛哥双重国籍。2005 年阿里偕同妻子返回美利亚，就近照顾年迈的父亲，以经营咖啡店为生。

2006 年，西班牙当局怀疑阿里涉嫌恐怖主义活动，但没有任何证据。2008 年，摩洛哥当局又以新的恐怖主义罪名要求引渡阿里，使他被西班牙当局监禁，此后被单独囚禁 2 年 8 个月。阿里曾 3 度绝食抗议，但因健康恶化而停止。

然而这才是他苦难的开始。2010 年 12 月阿里被引渡到摩洛哥，他说情报人员将他关在秘密监狱酷刑长达 12 天，当他终于被移送到首都拉巴特 (Rabat) 附近恶名昭彰的萨雷 2 号 (Salé II) 监狱时，其它受刑人表示，阿里身上的刑求伤痕以及心理遭受创伤的程度令人震惊。

2011 年 11 月，法院仅依据阿里被刑求后的自白，即以非法使用武器和参加意图从事恐怖行动组织等罪名将他定罪，并判处 12 年徒刑，目前他正在狱中服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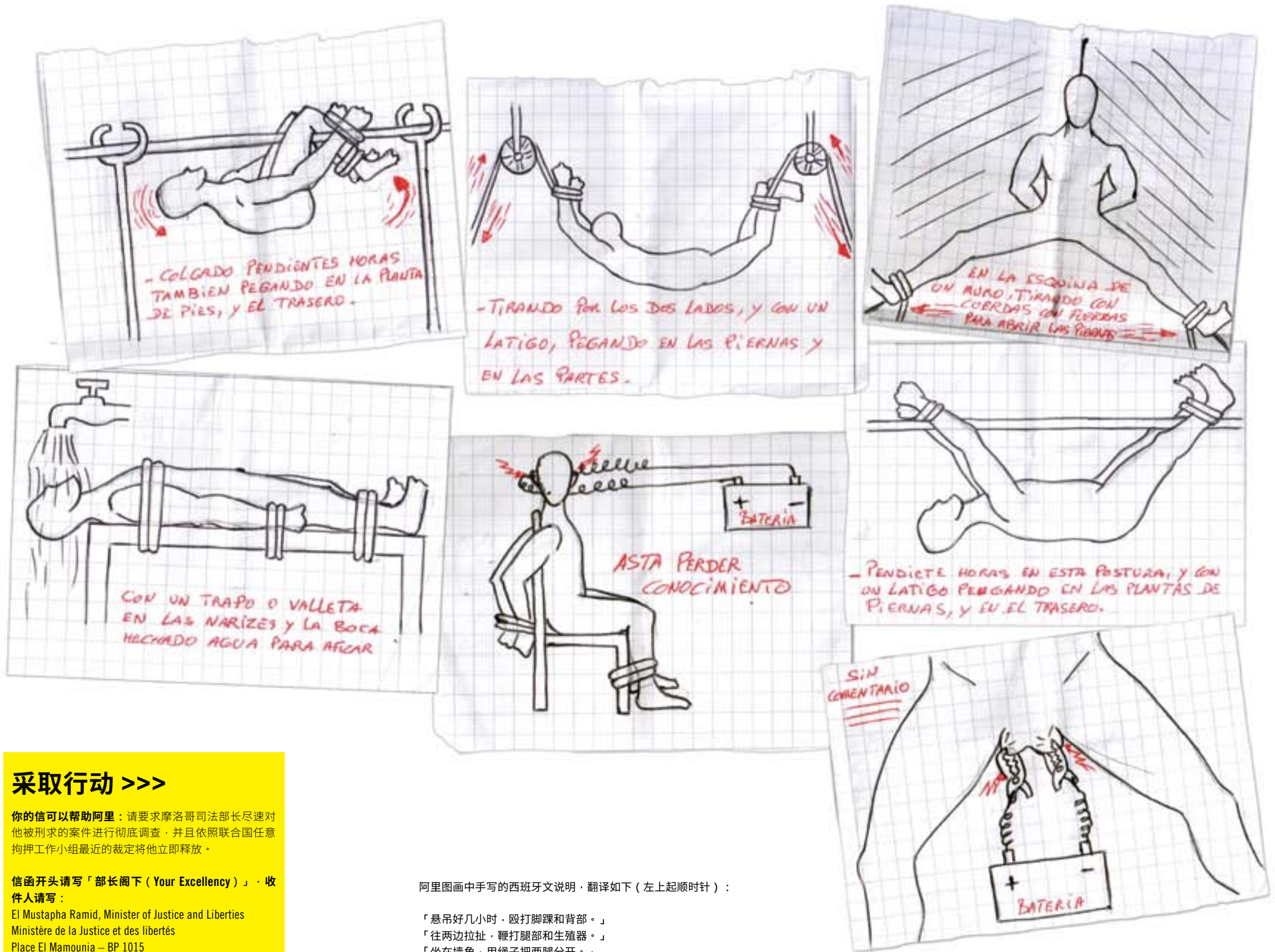
此后，阿里说他曾在牢房中被强迫脱光衣服，而且不准睡觉。他在 2013 年 7 月和 8 月再度绝食抗议，尽管他的家属、律师和国际特赦组织多次申诉，摩洛哥当局迄今未对他指控遭受酷刑的案件进行调查。

采取行动 >>>

你的信可以帮助阿里：请要求摩洛哥司法部长尽速对他被刑求的案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且依照联合国任意拘押工作小组最近的裁定将他立即释放。

信函开头请写「部长阁下 (Your Excellency)」，收件人请写：
El Mustapha Ramid,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Liberties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et des libertés
Place El Mamounia – BP 1015
Rabat, Morocco

Fax: +212 537 73 47 25



阿里图画中手写的西班牙文说明，翻译如下（左上起顺时针）：

- 「悬吊好几小时，殴打脚踝和背部。」
- 「往两边拉扯，鞭打腿部和生殖器。」
- 「坐在墙角，用绳子把两腿分开。」
- 「维持这种姿势几小时，鞭打腿部和背部。」
- 「无可奉告」/「电池」
- 「直到失去意识」/「电池」
- 「用胶带或抹布盖住口鼻灌水，让人窒息。」

All images © Private

被夺走的未来

摩西斯·阿卡图巴 (Moses Akatugba) 原本是一个对未来怀抱憧憬的中学生，却遭受酷刑成为死刑犯。他的人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又能如何帮助他呢？

当年 16 岁的摩西斯·阿卡图巴是奈及利亚南部一名普通的学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他，刚考完升学考试，正紧张地等候发榜。他梦想能考上医学院，达成父亲的期望。

2005 年 11 月 27 日，他离家去拜访阿姨，但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回来，他的妈妈开始担心。身为寡妇的她，在三角洲 (Delta state) 大城市艾夫伦 (Effurun) 内的市场卖小吃维生，抚养 5 名子女。

「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我这辈子从未受到如此非人道的对待。」

如果当时摩西斯能够被允许与律师联系，甚至只要能打电话连络他的妈妈，就能保护他不受酷刑。但他失踪后 24 小时，完全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后来，一名当地的街头小贩找到摩西斯的妈妈，说她看到一群士兵把他抓走，从此摩西斯再也没有回家，他的人生由彩色转为黑白。」

「无法想象的痛苦」

摩西斯后来说，那些士兵用枪射伤他的一只手，并且殴打他的头部和背部，把他带到当地一处军营进行侦讯，要他指认那里的一具尸体。

摩西斯表示自己并不认得那名死去的男子，士兵又再度殴打他，接着带他到警察局。他说，那里的警员用砍刀和警棍粗暴地打他，把他绑起来，头下脚上悬吊在天花板风扇上，长达数小时，还用钳子拔掉他手指指甲。

「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摩西斯说，「我这辈子从未受到如此非人道的对待。」

警方怀疑他涉嫌持械抢劫，盗走 3 支手机、一些钱和凭证，他一概否认所有指控，但警察强迫他在两份事先写好的「自白书」上签名，作为起诉他的证据。

摩西斯的妈妈说，第二天当她终于获准到警局看儿子时，发现他遍体鳞伤，且没有受到任何医药治疗。由于摩西斯的伤势过重，她不得不花钱请医生连续 5 周来为他看诊，每周 3 次。

他还是个孩子

摩西斯接下来 8 年都在牢里度过，2013 年 11 月 12 日，他被判绞刑，判决基础是他的「自白」和抢案被害人的证词，负责侦办本案的警官从未出庭。

摩西斯被捕时还未成年，因此他不该被判处死刑，该判决违反了国际法；此外，任何以酷刑取得的「自白」，法院都不该允许作为呈堂证物。

但摩西斯并非特例，奈及利亚成千上万的人们都曾在酷刑下认罪。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发现，奈国军警人员习惯用酷刑逼供，而法院通常依据以此取得的「自白」定罪判刑，且针对军警人员涉及酷刑的指控，鲜少获得调查或办法。

酷刑通常在逮捕后关键 24 小时内发生，只要落实法律规定，允许嫌犯打电话给委任律师，就能保护他们，并可能阻止酷刑发生。

国际特赦组织和其它团体持续呼吁奈及利亚当局修改法律，将酷刑和其它虐待列为刑事罪行。

梦想破灭

今天，摩西斯成了一个身心重创、与世隔绝的 24 岁青年，2006 年被移送到一座偏远监狱后，他每个月只能见到家人两次。最近他告诉我们，「我从没想到自己竟能活到今天。」

摩西斯想当医生的梦想已破灭，他说，令他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被关在监狱内，而许多以前的同学早就大学毕业、找到理想的工作。

律师已对他的死刑判决提出上诉，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摩西斯仍然困在牢里，他已失去未来，且命悬一线。



采取行动 >>>

你的信可以为摩西斯伸张正义：请写信给三角洲州长，要求免除摩西斯的死刑，对他指控警方酷刑的案件进行独立调查。

开头请写「州长阁下 (Your Excellency) 」，收件人请写：
Dr. Emmanuel Uduaghan, Governor of Delta Stat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Government House, Asaba
Delta State, Nigeria

人权医师

奥劳拉·科拉蓉·帕容 (Aurora Corazon A. Parong) 医师长期与酷刑奋战的缘由，来自她本人被拘押的经验，在领导国际特赦组织菲律宾分会 7 年后，现在她努力为前总统马可仕威权统治时期 (1972-1986) 的酷刑受害人争取正义。帕容医师在访问中介绍她的工作，以及国际特赦组织「停止酷刑 (Stop Torture) 」倡议运动可以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您为什么会成为「人权医师」？

我从医学院毕业后，便到乡下从事小区健康服务，训练村民成为小区健康工作者，这么一来，即便当地没有医师，村民受训后也能互相帮助。

我在 1982 年 4 月开设诊所，3 个月后又因为治疗一名叛军而被逮捕，警察没有搜索令就闯进来，把皮下注射器、针头等医疗设备通通没收。

我被拘禁了一年半，期间曾被单独隔离监禁。他们没有对我的身体用刑，主要是在心理上折磨我。

刑满出狱后，我加入「医疗行动小组 (Medical Action Group) 」，一个由医护人员组成、为人权受害者提供健康服务的组织。起初我们只是治疗外部伤口，后来我们发展出生物心理学疗程 (bio-psychosocial services，结合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的治疗方法)，帮助酷刑受害者及其家属。

在担任医疗行动小组执行长 6 年后，我开始在「拘留者救援工作小组 (Task Force Detainees) 」工作，这是个纪录人权侵害事件的组织。2007 年，我加入了国际特赦组织。

医师如何帮助酷刑幸存者争取正义？

除了受害者和施刑者外，酷刑案件通常找不到目击证人，由于没有其它人作证或缺相关纪录，酷刑幸存者常常不相信司法可以还给他们公道，事实上也的确很困难。

医师可以协助进行医学和心理检验，取得遭受酷刑的证据，然后上法庭作证。有了充分的证据，法院才能受理案件，并增加将加害者定罪判刑的机会，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您和国际特赦组织是怎么搭上线的呢？

我是在被拘押时与国际特赦组织「邂逅」的，那时有些政治犯来自农村，却收到国际特赦组织成员寄来的卡片和信件，由于他们看不懂英文，所以我找他们读信和回信。

那些信件使我们士气大振，我们发现大家不但了解也关注我们的处境，警卫在检查信件时也会读

到内容，所以他们知道全世界都在看。

那些信件改变了警卫们的态度，渐渐地，他们愈来愈尊重我们。

在马可仕总统独裁时期，和菲律宾以外的人们建立连结非常重要，因为来自其它国家民众的声援，让我们有勇气继续为人权和自由抗争下去。

一名国际特赦组织成员，丹麦海军上尉艾瑞克·布洛许 (Erik Bloch)，经常写信给我，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一直都有保持联络，多年后终于在丹麦的人权会议上见到面，我们都非常开心。

身为行动者，你就是在捍卫人们的权利，过程中你会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伙伴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您和国际特赦组织「停止酷刑」倡议运动的期许是？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反酷刑公约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里头明定免于酷刑的自由，是绝对不容许被侵犯的权利，但酷刑依旧存在于世

上。我们菲律宾也已在 2009 年制定反酷刑法，然而直到今日，还是没有任何人因为执行酷刑而被定罪。

我们必须不断提醒各国政府，他们有责任预防酷刑，并确保施刑者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我希望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知道酷刑幸存者的真实故事——例如艾芙烈达·迪斯巴洛 (Alfreda Disbarro，见右侧边栏) 的遭遇，许多菲律宾的男男女女也都碰到过，但却没无闻且求助无门。

我希望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们能站出来，要求菲律宾政府处罚那些对艾芙烈达施以酷刑的人，并建立机制，预防酷刑再度发生。只要全球国际特赦组织成员团结一致，我们定能改变世界。

帕容医师现为菲律宾人权侵犯受害者索偿委员会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Victims' Claims Board of the Philippines) 成员，该组织类似其它国家的真相与赔偿委员会，主要对戒严时期的人权侵犯案件进行认定，并赔偿受害者。



最上图：2012 年 6 月 26 日，奥劳拉·帕容医师 (持布条者左起第二人) 出席第 6 届「够了！路跑反酷刑！」 (Basta, Run Against Torture!) 活动，该活动由菲律宾社运团体共同主办，纪念「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
上图：1982 年，奥劳拉被拘押时与母亲会面。

艾芙烈达的遭遇

艾芙烈达·迪斯巴洛 (Alfreda Disbarro) 是单亲妈妈，住在菲律宾奎松市，她在家附近的网络咖啡店里被警察拦截，控告她贩毒。她否认指控，并自动掏出身上所有东西接受检查，当时她口袋里只有一支手机及一枚 5 披索硬币。

警察拔枪瞄准她，一拳打在她的胸口上，将她上铐带到警局。艾芙烈达说，为了强迫她认罪，一名警官把她按在墙上，连续殴打她的腹部和脸部、拿棍棒打她、用手指戳她眼睛、她耳光，还将拖把塞进她嘴里，并抓她的头撞墙。

艾芙烈达被殴打后，好几天痛到吃不下饭，而且呼吸困难，持续呕吐。如今，她被控贩卖和持有非法药物，在当地监狱中等待开庭，尽管曾接受医官检查，但她指控警方酷刑的案件迄今未获调查。

采取行动 >>>

你的信可以帮助她：请写信给代理总督察 Alexander Roldan，呼吁尽速彻底调查艾芙烈达提出的酷刑指控，将加害者移送法办。

信件开头请写：「Dear Inspector General (总督察阁下) 」，**收件人请写：**Police Director Alexander Roldan, Inspector General, Internal Affairs Service,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Compound, Camp General Crame, Quezon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1100

Email: iasprd@pnp.gov.ph,
niasprd@yahoo.com.ph,
rias_ncr@pnp.gov.ph



令人难忘的夏令营

2011 年，成千上万的北非人民乘船抵达意大利小岛兰佩杜萨（Lampedusa），一度引起媒体关注。为调查头条新闻背后的真相，国际特赦组织意大利分会决定派遣一群行动者进驻扎营，没想到获得盛大回响，发展成年度盛会「欧洲 S.O.S.」运动。本刊特别专访活动筹办人法比欧·西孔第（Fabio Ciconte），他正忙着准备今年 7 月第 3 届保加利亚国际人权夏令营。

参加这个夏令营是我人生中很难忘的经验，来过与没来过夏令营的人非常不同，事实上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通常不大会有这种情感体验，但来过夏令营后，大家更能了解国际特赦组织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行动主义（activism）」一词背后的意义。

2011 年，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到兰佩杜萨，主流媒体称他们为「非法入侵者」。我们希望带行动者到现场去了解实情，思考可以如何改善现况，于是那年 7 月，共有将近 70 名意大利人在当地露营地待了一星期。

我们发现，真相和媒体报导截然不同，兰佩杜萨的居民并非种族主义者，也不觉得有所谓的「入侵者」，居民对媒体的负面报导非常不满。

居民用自己的小船救人

其实当地居民非常欢迎这些移民们的到来，他们不但提供对方衣物、粮食和饮水，还用自己的小船救人。记者、军队、警察、非营利组织工作者全都浩浩荡荡来了，却无人闻问居民们真正的想法。

为了对居民的善行表达感谢，我们决定在躺在沙滩上，用身体排出「谢谢（意大利语，grazie）」，拍下照片后印成明信片，分送给小镇居民。当地居民对此印象深刻，也很感谢国际特赦组织，他们第一次感到外国人也明白他们的处境。

我们的行动让人们了解到，北非移民出现在兰佩杜萨已有 10 年的历史，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闻，而 2011 年唯一的独特之处，只在于这几千人是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才来的。

正因如此，我们决定次年向欧洲发出「S.O.S.」求救信号，因为岛上每个人都认为，他们需要欧盟的协助，光靠一个小岛不足以保护移民的人权。

在人权侵犯地点上扎营

夏令营那一整个星期真是辛苦又紧张，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透过行动推广「欧洲 S.O.S.」运动，并且训练大家如何采取行动，将讯息散播出去。

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者从欧洲各地前来，和这里的难民与移民站在一起，重点是要带着自己的经验过来，和每个人并肩行动，不要扮演「特别来宾」（参阅第 20-21 页萨雷和库夏的故事）。

我们在发生人权侵犯事件的各个地方举办营队活动，为了进行细部规划，先理解当地实际情况，接着分成几个小组发想行动，例如行动组、传播组、倡议组等等。

一星期后，我们开始行动，去年在希腊莱斯博斯岛（Lesvos），我们从船上发出 S.O.S. 信号；2012 年，大家站在兰佩杜萨海里排列出「S.O.S.」的字样（左图），凸显许多难民与移民在地中海灭顶。

今年 7 月，我们希望达成两项目标：让全世界知道难民与移民在保加利亚的处境，再来是难民与移民的人权议题。我们也计划跟当地行动者合作，让保加利亚民众更了解来到他们国家的人境。

左图：2012 年，行动者在兰佩杜萨岛海边向欧洲各国领导人发出「S.O.S.」求救信号，2011 年迄今，至少已有 2,600 名难民和移民在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途中丧生。

群有何需求和权利，目前我们正和保加利亚赫尔辛基委员会（Helsinki Committee）共同策画这个夏令营。

改变行动方式

前两届的国际夏令营已改变人们为「欧洲 S.O.S.」采取行动的方式，3 月 20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会场外，由国际特赦组织策画的沙滩快闪抗议，就是一个例子。

今年 7 月，世界各地的行动者将聚集在保加利亚某个热门的移民地点，与当地行动者和难民共同进行倡议运动，对我们而言，这就是行动主义的新方向，因为外面的世界能因此实际看到国际特赦组织正在做什么，这也是为什么现身参与如此重要。

法比欧·西孔第是国际特赦组织意大利分会的行动顾问。

了解更多 >>>

我们举办「欧洲 S.O.S.」国际人权夏令营以培力和训练行动者，将人们聚集起来，分享彼此的想法和经验，参与者将成为这项运动的「大使」，回到自己的国家和社群继续努力，推动国际特赦组织的全球运动。

请联系在地的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以了解更多详情，或上活动网站：www.whenyoudontexist.eu，或在脸书上搜寻：When You Don't Exist。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 Giorgos Moutaris)

「这个营队改变了一切」

2011 年，萨雷·伊布拉欣（Saleh Ebrahim）付给人蛇集团 3,500 美元后，徒步跨越希腊与土耳其边界。来自索马利亚的萨雷，目前在希腊首都雅典申请政治庇护，靠翻译为生，他告诉我们，2013 年他参加国际特赦组织在莱斯博斯岛的人权夏令营后，改变了他人的人生，使他成为一名行动者。

争取人权和人权被侵害的人们必须站在一起。我以前从不曾和来自以色列的人握手，但那次在莱斯博斯的营队改变了一切，直到今天我仍不断谈论、书写并思考在那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是到那里自怨自艾，而是在那里讨论明天要做什么、讨论人权、讨论我们如何改变现状，大家都在为素昧平生的人们而奋斗。

我在希腊曾两次遇到攻击，第一次他们打断了我的手臂，那时我真的非常沮丧，身为难民，我们不敢走出来，因为实在太害怕了。我可能会死在雅典，但我不想坐以待毙。

我有些朋友已经离开，并在瑞典、挪威和芬兰取得难民身分，他们问我为何还留在希腊，但我就是要留下来，而且我有权利留在这里。这是我的选择，我绝不离开，这也是我努力的目标，且这个地方需要有人做事。

这片海洋再也不是海洋，而是墓地，我的朋

友也许就在那艘船上（2013 年 10 月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外海沉没），他们死了，他们消失了，每天都听到这种事情发生。

我坚持当一名人权工作者，不论任何代价，因为我很荣幸能参与这样的工作，这是我们真正应该努力的事，而不是为了土地、石油或金钱奋战，此外，我们不使用武力，所以人们愿意加入。这样的经验真是太好了，我愿为此投入整个人生。

上图：2013 年 7 月在希腊的莱斯博斯岛，行动者从爱琴海发出 S.O.S. 求救信号，要求欧洲各国政府停止在欧陆边界侵犯难民与移民的人权。

幸运的难民

「欧洲 S.O.S.」营队行动就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核心宗旨，正如由伊朗来到希腊的难民库夏·巴伦米（Kusha Bahrami）所说：结合人们的热情与信念，推动改变。

我名叫库夏·巴伦米，是来自伊朗的幸运难民。我很可能像在希腊小岛上遇到的叙利亚难民那样，全家被走私集团遗弃在三不管地带，为了去找水给孩子们解渴，反在途中遭到拘留，因为丢了证件，也无法证明自己来自叙利亚。

我也可能像在雅典的索马利亚男孩那样，放学回家途中被抓起来痛殴；或是那个逃到雅典的巴基斯坦青年，只因肤色不同，在上班途中遇袭身亡。

我是个幸运的难民，但或许也没那么幸运。刚到希腊时，我试图向警方申请庇护，并出示在土耳其拿到的联合国难民署核准文件，却得到一顿痛打，然后在拘留所被关了 3 个月。

我为了和我妈妈会面而被迫绝食抗议，也因为害怕被遣返而被迫试图自杀。

直到现在，即使事隔多年，且我已是自由之身，却感觉自己像是被关在家里的囚犯，仍担心走在大街上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希腊，而是在欧洲各地蔓延。

国际特赦组织的「欧洲 S.O.S.」运动即是要保护像我这样的人，去年我们土耳其附近的希腊岛屿莱斯博斯进行一周行动，抗议难民和移民在欧洲各国边界遭遇的情况。我们的动机就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核心宗旨：结合人们的热情与信念，推动改变。营队结束后，我们的参与者比以前更积极 10 倍。

世上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们，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我们需要更多人并肩作战，只要你无法接受欧洲各国对待难民和移民的政策，就是我们的支持者。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造成改变。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上图：库夏·巴伦米（左）和尼克·卡沙巴基思（Nikos Kasapakis）在国际特赦组织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人权夏令营，2013 年 7 月于希腊的莱斯博斯岛。

采取行动 >>>

接下来几个月非常关键，今年 6 月，欧盟即将针对移民与庇护采取新策略，藉由「欧洲 S.O.S.」运动，我们希望促使各国重视人命先于国界。

请在推特上标记 #SOSEurope，加入对话，并追踪 @dontexisteurope

众人发声促成改变

透过我们新发起的「我的身体 · 我的权利」运动，我们和尼泊尔妇女利运动者合作，培力群众，让她们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方式发声并参与决策。

来自尼泊尔中西部代列克地区的芮娜 · 柏克瑞尔 (Reena Pokhrel) 来到加德满都，坐在一屋子的陌生人面前。她长途跋涉来到首都，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公开演讲，谈论许多妇女连对家人都不敢启齿的话题。

她以专家的身分出席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发表会，该会议于 2 月 20 日举行，报告主题为《不必要的重担：尼泊尔的性别歧视与子宫脱垂问题 (Unnecessary Burden: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uterine prolapse in Nepal) 》。透过这个机会，她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恐怖经历。

15 岁就结婚的芮娜，10 年来共生下 6 名子女。初次分娩后，她便罹患子宫脱垂症——一种骨盆肌肉无力导致子宫下降到阴道部位的疾病，因为害怕伴随这种病症而来的污名，她隐忍剧痛长达 21 年，才终于获得所需的治疗。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指出，尼泊尔的性别歧视是造成子宫脱垂高发率的根本原因，发表这份报告是国际特赦组织的全球运动要求尼泊尔政府将子宫脱垂视为人权问题的第一步，要求尼泊尔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消除性别歧视。

这原本就是尼泊尔妇女权利运动者长期的目标，经过她们经年的努力，已逐渐在当地看见成效。

前线行动者

这群行动者包括乌佩瑞蒂医师 (Dr. Aruna Uprety) 和莎米达 · 普拉丹 (Samita Pradhan)，她们是尼泊尔妇女运动第一线的中坚份子。

乌佩瑞蒂医师是公共卫生和人权专家，参与创办非政府组织农村健康教育服务信托基金会 (Rural Health Education Services Trust)。27 年来，她一直为改善尼泊尔妇女的生殖健康而努力不懈。

「1995 年，当我在尼泊尔西部工作时，」今年 3 月她对我们提起这段回忆。「我为妇女举办了小型的健康教育营队，在 7 天内，我们为 600 名妇女做身体检查，发现其中 150 人患有某种形式的子宫脱垂。」

「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已为子宫脱垂问题倡议多年，这一次尼泊尔国内外终于了解到，这是一项人权议题。」

这个经验促使她将当地情况写成短文，投稿到一家尼泊尔报社，就这样开始逐渐提升公众意识。她不停地写文章，将自己遇到最严重的案例与社会大众分享。

「我们发现许多女性会把各种东西塞进阴道里，以免子宫掉下来，像是石头、手镯...任何能挡住子宫垂落的东西，」她说。「我记得有名妇女塞了一个避孕环，15 年都没拿出，她不知道应该要每 3 个月更换一次。为了这样的事情，我写了很多关于子宫脱垂的文章登在全国的报纸上，并且呼吁政府应该提出解决方案。」

她的决心终于带来正面效果，「其它行动者也开始谈论并采取行动，」她说。「我们提出必须预防子宫脱垂的诉求，我们知道卫生工作者、护士和助产士都必须了解如何预防这项疾病，于是开始为这些人们提供训练，而子宫脱垂的病例也跟着下降，这项小小的计划最后带来的成效很不错。」

一步一脚印

莎米达 · 普拉丹 10 年前开始倡导妇女生殖权利时，感觉举步维艰。现任农业生态发展中心 (Centre for Agro Ecology and Development，简称 CAED) 执行长的她仍然记得当初遭遇到的挑战。

「起初真的很难说服人们及团体参与防治子宫脱垂的工作，大家的接受度不高，」她说。「现在，尼泊尔全国各地大约有 20 个基层妇女团体和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 Prakash Mathana)

CAED 合作，农村妇女已经组织起来，要求政府保障妇女健康权，并提供健康服务。」

她们的努力也得到政府的响应，「政府有很大的改变，他们成立了一个单位，所以在健康与人口部家庭健康处有了联络窗口，我们也有空间可以讨论相关议题。」

尽管如此，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特别是关于这种病状的预防。「减少性别歧视和确保生殖权利是 CAED 的长期目标，」她说。「很难让在地的男性、女性了解什么是生殖权利，大家都以为子宫脱垂症是产后妇女的正常情况。同样困难的是说服决策者和捐款者了解这是必须预防的

上图：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 · 谢蒂 (Salil Shetty，左坐者) 和乌佩瑞蒂医师 (立者) 出席「我的身体 · 我的权利」全球起跑活动，2014 年 3 月 6 日在尼泊尔中部努瓦寇区 (Nuwakot) 沙蒙卓塔尔村 (Samundrataar)。

问题，他们希望马上看到成果，因此认为只要提供外科治疗就够了。」

对她们来说，国际特赦组织强调子宫脱垂症和性别歧视的关联，可以帮助她们争取全面预防这种疾病的策略。「放任子宫脱垂问题不管是违反宪法的，有了国际特赦组织的这份报告，我们可以拿去劝说尼泊尔决策者和各国政府，」乌佩瑞蒂医师说。

「因为国际特赦组织开始关注，所以尼泊尔政府不得不重视这个议题，」莎米达说。「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已为子宫脱垂问题倡议多年，这次尼泊尔国内外终于了解到，这是一项人权议题。」

超过 8 万 5 千人已经联署了 >>>

谢谢大家共同呼吁尼泊尔政府正视子宫脱垂的人权问题，详情请见：
www.www.amnesty.org/unnecessaryburden



启动全球对话

从偏远农村到因特网，国际特赦组织「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运动将于全球开启对话，讨论性与生殖权利

在尼泊尔中部的小村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谢蒂（Salil Shetty）与当地妇女运动者与诺瓦寇区的农村妇女们会合，共同讨论尼泊尔女性面临的歧视，以及这样的性别歧视如何使她们无法参与关于自己身体和生活的决策（请见第22页）。

「藉由『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运动，我们希望帮助下一代了解并主张他们的性与生殖权利，」谢蒂在全球运动起跑时表示。

同时，国际特赦组织以一系列惊人的影像带动全球在线讨论，这些作品是由旅日艺术家 Hikaru Cho（又名 Choo San）专门为国际特赦组织「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运动创作的身体彩绘艺术。

愈来愈多人上传自己的身体彩绘照片，开始对话，同时也为了赢得 Hikaru Cho 的原创作品，全球社群的讨论已逐渐浮现，准备捍卫性与生殖权利。这项运动将一路进行到 2015 年，特别是在尼泊尔、布吉纳法索、萨尔瓦多、马格里布（包含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撒哈拉、突尼西亚）和爱尔兰，详情请关注近期 WIRE 报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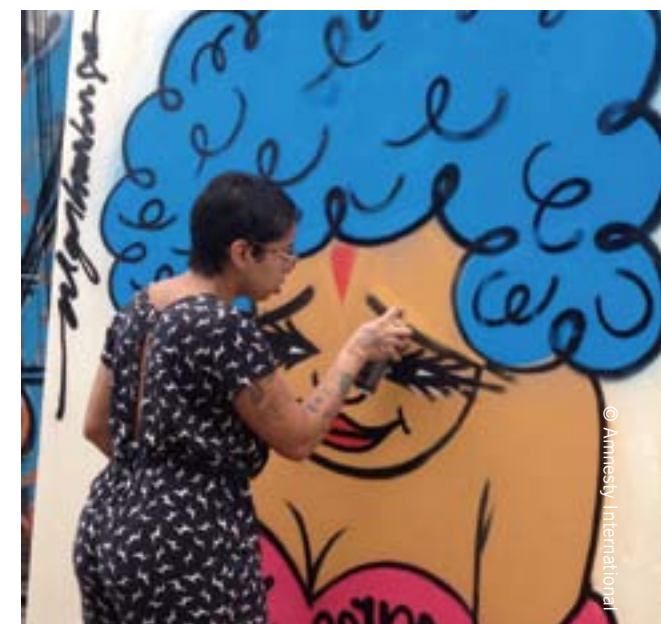
采取行动 >>>

请在推特上加入我们性与生殖权利的全球对话：
#MyBodyMyRights

请至以下连结了解更多运动详情，并采取行动：
www.amnesty.org/mybodymyrights

看看是谁赢得了身体彩绘艺术征件比赛：
www.livewire.amnesty.org

上排起由左到右：「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起跑活动在摩洛哥、多哥、奥地利、加拿大、尼泊尔、日本、里约、西班牙、马利和墨西哥。



现在开始
由你而起
~~终结酷刑~~

#STOPTORTURE

AMNESTY
INTERNATIONAL

